

李向玉 著



中华书局

汉学家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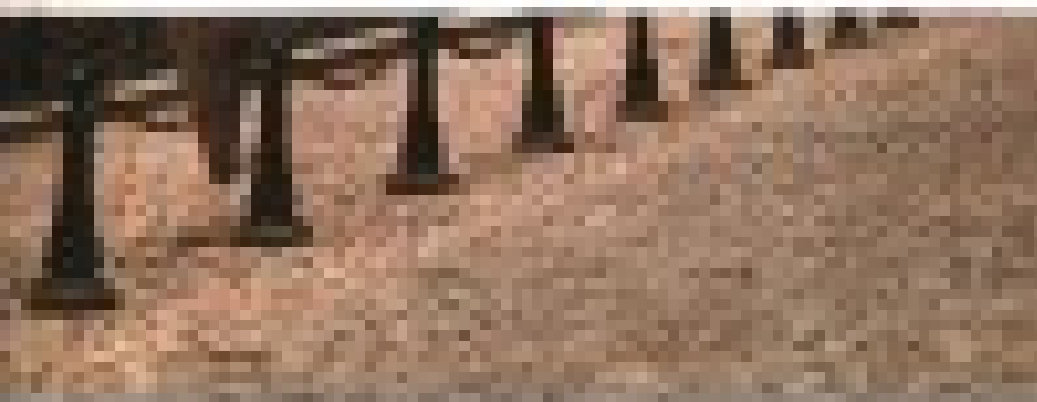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叔季家的困境

澳門基督教修學院研究





李向玉 著

汉学家的摇篮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李向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344-0

I. 汉… II. 李… III. 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741 号

书 名 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

著 者 李向玉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1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344-0/K·2394

定 价 2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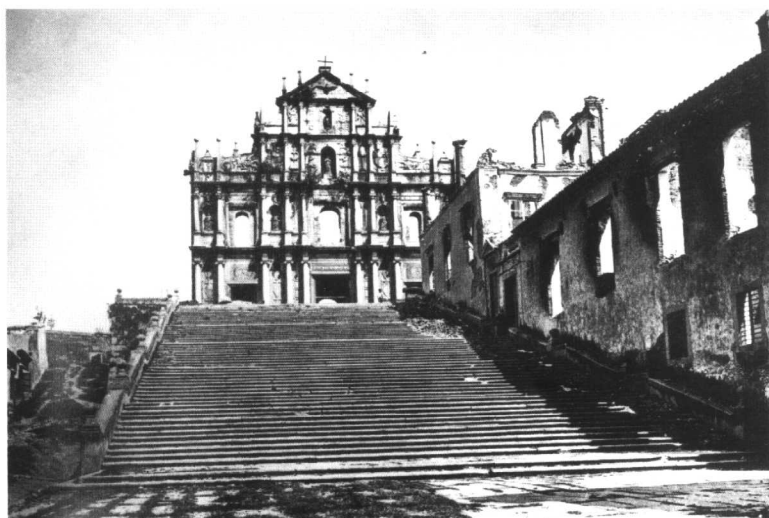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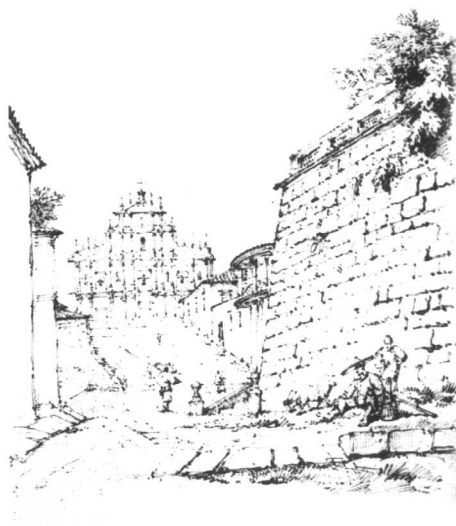


李向玉 1953 年生于北京。1975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同年赴澳门进修葡萄牙语言文化课程三年，后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深造一年。2000 年获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博士学位。1999 年任澳门理工学院院长至今。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学葡语易犯的错误》（独著）及《中文公文写作教程》（主编）；翻译葡萄牙文小说《葡京群象》。迄今在国内外刊物发表有关中葡翻译、澳门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一位荷兰人所绘地图中大三巴的位置（作于 1726 年）

英国画家钱纳利笔下的
大三巴（作于 1834 年）



大三巴（摄于 1874 年）



大三巴牌坊近貌



作者向文德泉神父请教



作者赴葡拜访耶稣会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洛佩斯

序 言

陈胜彝

1999年12月20日,位于中国南海之滨、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公里的澳门,一度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那里举行着被诗人形容为游子回归母亲怀抱的盛典。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也许只是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而学术文化界对澳门的兴趣则更为长久和广泛。从16世纪中期开始,澳门这个狭小的半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扮演着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角色。它成为中国与欧洲诸强交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舞台。在这块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剧。由此形成的澳门独具特色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距今200多年前,曾经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管理过澳门的印光任和张汝霖就撰写了不朽的史著《澳门记略》。大约180年之前,瑞典学者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出版了他经过精心研究写出的杰出作品《早期澳门史》^①,成为最早的系统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西文著作。时间已

① 该书已有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进入 21 世纪,但学术界对澳门的研究不但没有随着澳门的回归而落幕,反而在持续升温。而且,研究澳门的学术队伍逐渐突破了人文学者的范围,使澳门研究领域呈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一批专著、论文、辞书等成果的出版表明,澳门研究已是一项蓬勃兴起的学术事业。

这种局面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但在另一方面,比较了解这一学术领域的人士不难发现,在很多有关问题上,尚未产生令人满意的学术成果。就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而言,不少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的探讨,在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似乎就难以继续深入下去。甚至出现在较长的时期内,出不了开拓性的成果,同行之间辗转引述,研究水平原地踏步的情形。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同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缺少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问题作深入的专题探讨,二是在资料的发掘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一些具有使命感的学者已经觉察到这方面的问题,在最近一些年里作了富有成效的努力。李向玉先生即是其中的一员。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一书,是他耗费数年心血完成的一部专著。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那样,圣保禄学院在澳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作为“远东传教士的摇篮”,曾经是辐射力达到整个东亚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宗教重镇,在天主教东传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独特地位。它作为与早期澳门城市相伴成长的教育机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门崛起的历程,因此在澳门教育史和整个澳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它存在和活动的岁月

里,为了宗教目的和其他原因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活动的不少西方传教士,都与这个著名的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也以特定的方式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个发挥过如此重要影响的宗教文化机构,当然是很值得研究者关注的。由于各种原因,以往的论著,特别是有关的中文出版物,对它的叙述基本上都语焉不详,甚至有不少讹误之处。研究该学院的西文论著也很少见,特别是有分量的专著仍然缺乏。因此,李向玉先生选择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无疑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其实,从《澳门记略》开始,历代研究澳门历史文化的著作,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圣保禄学院。历代学者中也不乏了解该学院之重要性的人士。之所以没有人对这个宗教文化机构进行认真透彻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人们对它的历史价值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以寻找研究这个学院的资料,特别是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其历史面貌的第一手资料。有关中文资料零散而琐碎,无法再现当年之旧貌。似乎随着该学院在1762年的关闭,有关它的种种记载也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只在浩瀚的文献里留下若干蛛丝马迹供人们浮想推测。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本书表明,有大量的与圣保禄学院有关的原始文献,至今仍比较完整地保存在葡萄牙的档案馆里。只是由于人们熟知的种种原因所造成的相互隔绝,才使关注数百年前往事的学者无法访问这段被尘封在档案馆里的历史。甚至连这批材料的存在,也并非广为人知。西方学者对这批文献的研究利用,也是晚近才出现的动向,而且也不够充分。李向玉利用多次访问葡萄牙

之便,到该国阿儒达王室图书馆,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找、研究当年耶稣会士保存下来的文献,重点研究利用了这些资料中比较完整的、以古葡文写成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他在参考已知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在葡国访得的圣保禄学院原始文献作为本书的主要资料基础,这就使他的研究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这些资料,不仅使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而且必将为开展与澳门历史文化有关的其他课题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参考。

以此为基础,李向玉先生力图通过仔细的研究再现圣保禄学院的历史。圣保禄学院从开办到关闭的始末究竟怎样?它的教学与管理制度有什么特点?它的教师和学生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人物?附属该学院的几个机构的情况怎么样?等等问题,原来都是人们不甚明了的问题。而系统地了解这些问题,又是我们全面了解澳门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都进行了清楚的论述。有关该学院的基本史实,由此得到了比较准确的重建。这个存在过一百七十年、在各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院的基本情形,从模糊到清晰,显现在我们面前。书中对若干史实的叙述和考证,的确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如作者对圣保禄学院开办过程与目的的论述(见本书第一章),不仅弄清楚了相关的史实,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对澳门在东西方交往中的地位和天主教早期在远东地区的传教策略,产生进一步的认识。又如,作者根据原始文献对圣保禄学院关闭时间进行了考证,具体时间为1762年。这个观

点,其实早已有人提出。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就说过:“这所东方知名的学府在 1762 年因葡王若泽一世的命令而关闭,其成员被遣散。”^①但直到最近,还有些学者坚持其他的说法。本书直接利用 1759 年葡萄牙国王解散耶稣会的命令,来证明圣保禄学院关闭的时间(见本书第 261 页),是令人信服的,大致可为这一似乎有争议的问题定谳。再如,作者对曾在圣保禄学院就学的华人教徒吴渔山和陆希言的情况作了一些介绍(本书第 115 页),相信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都会感兴趣。作者在集中精力研究圣保禄学院本身史实的同时,还注意放开眼界,将这个学院的历史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本书专辟一章,论述圣保禄学院在天主教传教史、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西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成绩。

总之,本书是研究澳门历史文化方面一部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必将对其他学术课题的研究产生有益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对圣保禄学院的研究可以借鉴的成果不多,研究的时间比较有限,关键性的资料远在葡国,并且以古代葡文写成,阅读利用不易,所以本书还存在一些值得改进之处,也是难免的。事实上,无论是在资料的挖掘方面,还是在史实的深入研究方面,本书都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本书的研究为基础,作者如能进一步努力,将会取得更多、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李向玉先生在澳门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近年又先后担任澳

① 《早期澳门史》中译本,第 52 页。

门理工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长期以来,他对澳门的历史文化保持相当浓厚的兴趣。1997年,他开始在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学习,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这三年多的时间,他不仅在事业上不断进步,而且在学业上刻苦努力,奋发向上,在学术研究上开始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他在公务繁忙之余,努力不懈,坚持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其精神实属可嘉。他对待学业态度极为认真,往来奔波于澳门和广州之间,虚心向我们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各位老师求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中得到多位著名专家的一致赞许。他在研究和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可谓历尽艰辛,矢志不移,克服种种困难,以严谨治学精神完成论文,显示他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具有从事学术研究事业的才华。本书的出版,表明他的学术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高兴和欣慰,爰草是篇,以为序。

2001年1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一、选题的意义

今天,“圣保禄修院遗址”(As Ruínas de São Paulo)(通称“大三巴牌坊”)已经成为澳门的标志。凡是到过澳门的访客,以及通过各种媒体对澳门有所了解的人士,都会知道这个著名的修道院。但是,不仅一般人,甚至对中国教育史作过专门研究的学者,也未必知道在这个修道院里曾经建立过澳门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亚洲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例如,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史》^①和 90 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研究》^②,都完全没有提及这所学校。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有关这个学校的原始材料大部分用葡文写成,而且保存在葡萄牙等国,中国内地学者很难有机会利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学者对这个学校也知之甚少。

随着澳门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国际知名度的提升,特别是 1987 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确定中国在 1999 年 12

①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越来越引起国人和世界的广泛关注,澳门的历史与文化也成为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1993 年 3 月,澳门举行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 年,澳门又举办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即“第一届澳门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和纪念澳门圣保禄学院创办 400 周年(1594—1994)的“宗教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述三个研讨会集中了不少中外著名学者,如内地的季羨林、任继愈、张岱年、汤一介等,香港的饶宗颐,澳门的文德泉神父(Pe. Manuel Teixeira),台湾的张春申,美国的马拉特斯塔(Edward Malatesta,内地译为马爱德)、维特克(John W. Witek),日本的迭戈·结成(Diego Yuuki)等等。在前两个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提交了涉及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学术论文。而第三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关于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研究,有十几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该院的历史与影响。本次会议对笔者有很大启发,本文亦参考和吸收了这次会议的一些成果。

笔者早些年对澳门历史文化进行过一些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澳门圣保禄学院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1997 年 9 月,我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师从陈胜彝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当我同陈师讨论学位论文选题时,陈师鼓励我对澳门圣保禄学院作系统、全面的研究。他还反复指出,史学研究贵在求真求实,而原始文献资料在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以往研究圣保禄学院的成果对葡文文献的利用远不够充分,他要求我多收集葡文文献,并注意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同时还必须注意吸收中